

# 行政区划调整与企业家时间配置： 基于撤县设区的视角<sup>\*</sup>

钟粤俊 梁 超

**内容提要：**企业家才能及其优化配置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撤县设区有利于促进市场一体化、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然而，鲜有研究关注行政体制改革和城市集聚效应对企业家微观经营管理行为的影响。本文研究撤县设区如何影响企业家的时间配置，并基于民营企业调查数据构造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1)撤县设区后企业家的生产经营活动时间增加，公关招待等非生产性活动减少，改革对整个城市范围存在外溢效应；(2)改革改善营商环境，显著减少了企业的寻租和摊派支出；(3)大城市的改革效应更大，与市中心距离越远的县改区的正向效应越弱，反映出集聚效应的重要性。本文认为符合集聚规律的县改区有助于促进企业家才能向生产经营活动配置。

**关键词：**撤县设区 企业家时间配置 生产经营活动 寻租行为 摊派费

**作者简介：**钟粤俊，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经济学院讲师，200062；

梁 超（通讯作者），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特别资助博士后，250100。

**中图分类号：**F2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21)08-0097-16

## 一、引言

企业家才能在不同用途间的优化配置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之一，企业家人才在创新等生产性活动和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之间的分配差异，是不同国家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Baumol, 1990; Murphy 等, 1991）。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企业家人才从政府向市场部门、从国有向民营部门的再配置（张维迎, 2010; 张维迎、王勇, 2019）。文献中往往以创新、创业活动来度量企业家精神（吴晓瑜等, 2014），人力资本在跨部门、跨行业的配置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受到学者的关注（Hsieh 等, 2019; 袁志刚、解栋栋, 2011; 李世刚、尹恒, 2014, 2017）。但是，经济学文献对企业内部的微观治理，尤其是企业家时间配置的关注较少。企业家如何将有限的时间配置分

<sup>\*</sup>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城镇化背景下的基础教育资源布局调整研究”（71903110）；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基础教育资源的时空错配：理论、实证及对策研究”（2021T140416）；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公共卫生建设的长期影响”（2020M682149）。本文荣获第十四届上海青年经济学者优秀成果奖。作者感谢韩立彬、黄伟、张天华提供的数据支持与处理帮助，感谢“第八届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交叉研究”研讨会，2019年中国青年经济学家联谊会，2019年中国制度经济学论坛以及陈长石、陆铭、向宽虎、许志伟、张翥等的修改意见和讨论。文责自负。梁超电子邮箱：cer\_liangchao@sdu.edu.cn。

配到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中,不仅关系到企业的日常经营运转,也反映出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宏观政策变革的影响。因此,研究企业家的时间配置对理解当前中国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行政区划调整成为适应城市化进程、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其中,比较重要的行政区划调整包括撤县设区和撤县设市改革。<sup>①</sup>关于撤县设区改革,有很多文献讨论其对人口集聚(唐为、王媛,2015)、企业融资约束和出口行为(卢盛峰、陈思霞,2016,2017)、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资源配置(唐为,2019b)、经济增长的影响(邵朝对等,2018)。本文研究撤县设区改革如何影响企业家经营管理等行为,撤县设区作为行政上集权的改革,可能通过以下方面影响企业的经营管理。首先,撤县设区改革有助于形成统一的市场,减少跨行政区的资源误配(唐为,2019b),并引发城市扩张和人口集聚(唐为、王媛,2015),更容易发挥城市经济的集聚效应,带来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增长(王贤彬、谢小平,2012)。既有研究发现,集聚会改变个体的工作行为,例如,Rosenthal 和 Strange(2008)研究城市集聚与劳动者工作时间的关系发现,集聚经济下由于竞争的增加,高技能人群的工作时间会随之延长。Francis 等(2016)研究城市集聚效应对企业 CEO 工作的影响发现,大城市的集聚效应使 CEO 工作竞争更加激烈,企业也愿意为此支付更高的薪酬来补偿 CEO 的努力工作。因此,本文认为撤县设区可以通过集聚效应影响企业家的时间配置,增加他们在生产经营管理上的工作时间。其次,撤县设区弱化了原县级政府的经济建设职能和支出责任,部分审批权限的上收有助于减少地方政府对辖区内企业的偏袒(卢盛峰、陈思霞,2016),甚至会减少企业出口(卢盛峰、陈思霞,2017)。这种管理权限的上收不仅弱化了原县级政府与企业的关联,也带来更高层面的治理水平,从而优化当地营商环境。更好的营商环境下企业家的公关招待时间也会减少,从而将更多的精力用于企业日常经营管理上。

作为经济活动和产出的主要载体和场所,本文从微观管理的视角研究撤县设区对企业家时间配置的影响。基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的撤县设区改革,利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 DID)研究城市行政区划调整对民营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撤县设区使辖区内民营企业家在经营管理企业上的时间分配显著增加,在公关、招待上的时间配置显著减少。换言之,撤县设区使企业家将更多的时间从非生产性活动转移到生产性活动上。通过变更处理组和控制组样本,本文发现撤县设区改革对本地市内企业存在显著的外溢效应,且对改革区县企业的影响较本地市非改革县市企业的影响更强。进一步地,文章从企业和行业层面分析发现,撤县设区使辖区内营商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具体表现为:民营企业面临来自政府和社会组织的摊派费用和寻租费用显著下降;管制类行业的企业在改革中受影响更大。文章进一步排除了可能伴随改革同步发生的政治晋升和财政转移支付变化等竞争性假说的干扰。最后,动态效应和平行趋势检验说明双重差分设定的可靠性,以及改革效果的持续性。异质性考察显示,大城市的撤县设区效果更明显,且距离市辖区较近(19 公里范围以内)的县改区才有显著的影响效应。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合理调整城市行政规划,打破区域分割带来的要素流动障碍,充分发挥集聚规模效应,可以改善地区营商环境并增加民营企业的生产性活动行为,减少其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有助于建立“亲”“清”型政商关系。

① 前者将县或县级市直接变成市辖区的一部分,意味着市区范围的直接扩大;后者意味着部分经济管制职能的分权(唐为,2019a;刘晨晖、陈长石,2019)。

同既有研究相比,本文有如下三个边际贡献。其一,研究视角不同,本文关注企业家群体的时间配置,深入企业内部考察企业家才能配置的影响因素。其二,研究对象不同,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民营企业,宏观上民营经济占国民经济产出和就业的比重越来越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关于民营企业行为的研究并不多。其三,研究关注行政区划调整对企业家行为的影响,厘清此关系有助于理解行政区划调整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的微观逻辑机制,基于准自然实验的外生冲击和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企业家行为,可以缓解内生性问题的干扰。

## 二、制度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行政管理体制经历过几次较大规模的变化。<sup>①</sup> 20世纪80年代撤县设市逐渐兴起并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顶峰。有学者研究发现撤县设市并未带来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Fan等,2012),中央也在1997年停止了撤县设市改革。但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城市扩张的欲望和动力依然存在,撤县设区成为各级城市缓解土地资源约束、扩大城市边界的重要手段。

撤县设区是将地级市管理的县或县级市改为区,最早的撤县设区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但作为政府推动城市化的手段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撤县设区一般是指直辖市或地级市通过行政手段将其所辖的县调整为市辖区。随着1997年撤县设市改革被终止,撤县设区的数量快速上升,并呈现空间分布广的特征,其范围覆盖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时期看,撤县设区存在阶段不平衡推进特征,2000年之前撤并数量较少,2000年及之后经历了两波撤并高潮:第一个快速推进阶段为2000—2006年;第二个快速推进的阶段为2011—2016年(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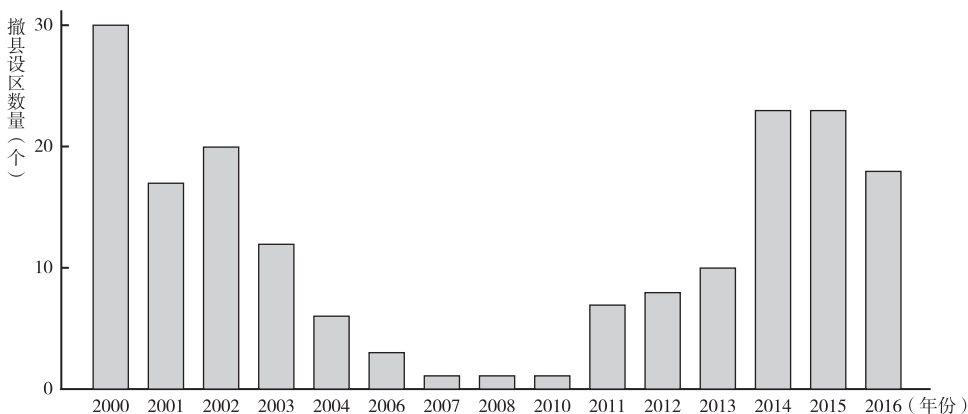


图1 撤县设区的时间演变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撤县设区的数据统计。

① 通常行政区划调整需经中央政府批准,地方政府可以凭借掌握的辖区不对称信息优势提出具体的设区申请方案,从而使行政区划调整也带有地方政府经济、政治等诉求。常见的行政区划调整模式有:撤县改市、撤县改区、撤市改区、撤区改市以及撤区改县。

从县到区的变化虽然仅是一字之差,但是行政管理体制和职能上意味着巨大的变化,具体体现在行政级别、财政体制、行政管理、发展导向和公共服务等几个方面。这些管理体制和行政职能的变化意味着市级政府的权力扩大,县域政府变为区政府之后的自主性相对下降,地级市政府可以进行统一的城市规划与产业布局,减少行政区间政府机构摩擦。由于与市辖区的行政边界弱化,更容易发挥城市经济的集聚效应,区域市场的行政整合可以带来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增长(王贤彬、谢小平,2012;唐为,2019b)。撤县设区减少了行政壁垒导致的各种扭曲,有利于人口、城市集聚和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积累,加快促进区域市场整合、区域协调,改善要素资源配置效率,弱化地方政治偏袒(卢盛峰、陈思霞,2016),削弱区县发展的边界效应(唐为,2019b)等都是地区营商环境改善的表现,这对企业家行为会产生直接影响。然而,既有文献关于撤县设区对营商环境直接影响的研究却是空白。本文关注民营企业家的时间配置如何受到撤县设区改革的影响。一方面,行政边界弱化,县域得以享受城市经济的集聚效应,从而带来市场经济活力,集聚经济下的竞争效应使企业家倾向于增加生产经营活动上的工作时间(Rosenthal 和 Strange, 2008; Francis 等, 2016);另一方面,行政管理职能部分上收到市级政府后,弱化原本县级政府与民营企业间的关联,从而减少地方政府对企业的盘剥(Dong 等, 2016),这种营商环境的改善也会减少民营企业与当地政府打交道的公关招待等时间配置。总之,本文预期撤县设区改革使民营企业家的生产经营活动增加、公关招待时间减少。

### 三、识别策略与统计事实

#### 1. 数据和识别策略

撤县设区改革需要经历“调研→反馈→方案确定→上报省政府、民政部和国务院批准”四个流程,地区层面渐进式的改革进程使该政策可以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估计。2000—2006 年和 2011 年之后是近些年撤县设区改革比较集中的时期(见图 1),为排除撤县设市改革的干扰,以及微观企业数据匹配的需要,1997 年以前和 2011 年之后发生的改革不在本文考察范围内。<sup>①</sup> 样本中大部分城市只经历一次撤县设区改革,发生撤县设区的城市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均有分布,具有良好的空间代表性。

本文所用微观数据来自中国私营(民营)企业调查(Chinese Private Enterprise Survey, CPES),该调查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国私(民)营经济研究会联合组织,开始于 1993 年,每两年进行一次。该调查采用多阶段抽样方式,调查对象为全国范围内随机抽样的私营企业和企业主,覆盖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调查样本涵盖国家统计局定义的 19 个行业大类。<sup>②</sup> CPES 调查具体询问了企业主体特征、行为以及企业相关经营状况。

本文使用 1997 年、2000 年、2002 年、2004 年、2006 年、2008 年、2010 年 7 次 CPES 调查数据与 1997—2010 年发生的撤县设区改革数据相匹配。由于 CPES 调查通常在调查年份的 1~3 月进行,且问卷设计中调查企业去年经营状况等信息。因此,与撤县设区改革匹配时将 CPES 调查年份提前一年,比如用 CPES 2002 数据匹配 2001 年撤县设区改革信息。本文研究撤县设区改革对企业家

① 2011 年以后撤县设市改革被重现提上议程。

② 具体数据介绍见 <https://cpes.zkey.cc/index.jsp>。历次 CPES 调查的样本结构和分布都比较稳定。

行为的影响,采用双重差分的识别策略。<sup>①</sup> 样本分为处理组(Treatment Group)与控制组(Control Group),本文的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划分包含三类。第一,基于县区层面划分处理组和控制组,将1997—2010年发生撤县设区改革县市的企业作为处理组,非改革地市的区县作为控制组,仅考虑改革县和非改革地市区县的识别策略。第二,由于撤县设区改革打破了市区与邻近县之间的行政分割,县市变为市辖区后,地级市政府可以进行统一的城市规划与产业布局,减少行政区间政府机构摩擦。市辖区和改革县市均直接受撤县设区改革影响,本部分将处理组定义为1997—2010年改革城市的改革县市和市辖区,非改革城市为控制组,在城市层面进行分析和讨论。第三,考虑改革的外溢效应。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县域经济发展受周围市辖区的影响。市辖区获得了撤县设区改革所产生的正向影响,有利于地市更好发展,进而产生改革的外溢效应,影响改革地市的非改革县市。本部分将1997—2010年发生撤县设区的地级市作为处理组,样本期内未经历撤县设区的城市视为控制组。具体来看,CPES样本覆盖的128个城市中,56个曾发生过撤县设区改革,成为本文的处理组,其他地区作为控制组。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Time\_allocation_{ijt} = \beta_0 + \beta_1 Merger_j \times Post_t + \beta_2 X_{ijt} + \delta_j + \sigma_t + \varepsilon_{ijt} \quad (1)$$

其中, $Merger_j$ 为政策虚拟变量,地区 $j$ 在1997—2010年有发生撤县设区的取1,未发生的取0。 $Post_t$ 为时期虚拟变量,发生改革当年及以后取1,之前或从未发生的地区取0。 $X_{ijt}$ 为一系列企业和城市特征的控制变量。 $\delta_j$ 为城市虚拟变量, $\sigma_t$ 为年份虚拟变量, $\varepsilon_{ijt}$ 为误差项。交互项 $Merger_j \times Post_t$ 是核心解释变量,其系数 $\beta_1$ 反映的是相对于没有发生改革地区的样本,撤县设区地区企业家时间分配的相对变化。

为保证结果的可靠与稳健,本文采用邻近地理匹配双重差分估计。具体而言,DID设定中处理组仍为那些发生撤县设区改革地区的企业,对照组则选取与改革城市相邻但未发生改革的城市企业样本(即地理上接壤)。这样做的好处是地理上相邻的地区其自然环境等各方面条件较为相似,可比性更强,使处理组和对照组在可观测的特征上更为相似。后文也采用全样本以及其他匹配方式进行DID估计进行稳健性检验,比如依据城市经济特征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估计(PSM-DID)。本文所有回归的标准误均聚类到地区层面。

$Time\_allocation_{ijt}$ 表示企业家在不同活动中的时间分配,本文重点关注其在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时间占比,后文也考察改革对其他非生产性活动时间和企业所面临的摊派等费用影响。我们以企业主日常经营管理时间占其总活动时间比重衡量企业家的时间配置<sup>②</sup>,企业摊派费用支出来自CPES调查“您企业去年在应付政府部门或社会组织各种摊派的支出”<sup>③</sup>。

① 双重差分估计的优势是可以控制处理组和对照组样本在政策实施前可能存在的差异,从而剔除二者在时间上的共同趋势。该方法允许处理组和控制组的选择非随机,只要两类地区在政策干预前的趋势相一致,便可得到无偏的估计结果。

② CPES关于企业家时间配置的问题包括:(1)企业日常经营管理时间;(2)外出联系生意、开会、公关和招待时间;(3)学习、休息时间。本文将用途(1)定义为经营管理的生产性活动时间,影响企业生产;用途(2)定义为公关招待,既包括影响生产性活动的外出联系生意和开会的部分,也包括影响非生产性活动的公关、招待部分;用途(3)定义为休息学习。大多数企业家每天的时间主要配置在这3部分,虽然每天有24小时,但可由个体支配的时间则因人而异,比如有些人体力恢复得慢,每天需要用于恢复体力(吃饭、睡觉等)的刚性时间支出就更多。为了让企业家的时间配置具有可比性,控制企业家可支配总时间变量。

③ CPES调查询问了企业去年的支出明细,主要包括三类:(1)企业正常运行的经营、管理费用,例如,净利润中用于出资人分红、税收、正常规费、员工工资、福利支出等;(2)公关、招待费用;(3)应付政府和社会组织等的摊派费用。近年不少关于对企业“摊派”的相关新闻报道,有的是政府机构摊派任务,有的是官员摊派费用。官员和政府机构等热衷于摊派的原因有:第一,上级部门摊派的指标,下级干部和基层单位要按期完成,否则,下级干部或基层单位在以后的评优和评价等方面会处于被动;第二,方式简单,一些不好化解的问题和任务分派到基层单位,被摊派单位只能积极充当先锋角色。

2. 样本选择和数据描述

关于样本选择和数据代表性问题,我们做如下处理和说明。首先,CPES 调查每两年进行一次,不同年份的问卷有轻微的调整,企业家时间分配信息仅出现在 CPES 2002—2010,企业各项支出费用的问题则在 CPES 1997—2010 调查中均有涉及。两类关键数据有少量的缺失,t 均值检验显示这种缺失是比较随机的,与企业特征并无显著关系,说明调查具有可靠性和样本良好的代表性。其次,本文基于城市—企业匹配展开研究,为避免企业数量过少带来的极端值干扰,本文将历次调查中企业数量少于 8 个的城市样本剔除。CPES 调查属于重复截面数据,并非面板追踪调查,但企业样本在不同年份—城市—行业层面上的分布较稳定,数据依然可靠。<sup>①</sup> 企业层面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全样本				处理组		控制组	
	样本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	均值 (标准差)	样本	均值 (标准差)
经营管理 时间占比	8828	0.344 (0.124)	0.000	1.000	6144	0.347 (0.125)	2684	0.335 (0.121)
公关招待 时间占比	8828	0.176 (0.099)	0.000	1.000	6144	0.175 (0.099)	2684	0.179 (0.098)
ln(1+公关 招待费用)	8669	1.679 (1.247)	0.000	7.004	6445	1.675 (1.259)	2224	1.690 (1.213)
ln(1+摊派 费用)	6821	0.823 (1.079)	0.000	6.217	5100	0.792 (1.064)	1721	0.915 (1.117)
Post×撤县设区	8828	0.520 (0.500)	0.000	1.000				
ln(企业 全年雇佣人数)	8828	4.043 (1.503)	0.000	9.798	6144	3.965 (1.495)	2684	4.239 (1.506)
企业主性别	8828	0.141 (0.348)	0.000	1.000	6144	0.143 (0.350)	2684	0.134 (0.341)
企业主年龄	8828	45.000 (8.383)	15.000	93.000	6144	45.170 (8.421)	2684	44.570 (8.272)

注:根据 1997—2010 年 CPES 数据统计。此处控制组样本根据地理匹配样本得到,故控制组样本较少;全样本下,控制组和处理组的企业样本量大致相当。

四、实证分析

1. 基准回归

撤县设区影响企业家时间配置的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首先,表 2 第(1)列给出改革县(或县级市)作为处理组,非改革城市的其他区县作为控制组,同时控制区县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表明,

① 为避免企业生存偏误的干扰,后文中我们仅保留成立时间早于 2000 年的企业样本展开考察,结论仍然稳健。为排除企业进入、退出的样本选择性偏差,我们讨论城市层面的撤县设区改革政策和城市企业家时间配置的关系,基于城市层面的企业家时间配置的分析可以剥离企业进入、退出偏误的影响,结论仍然稳健。



控制企业家总的可支配时间后,撤县设区显著增加了企业家在生产性活动上的时间分配,经营管理企业的时间比例显著增加 2.5 个百分点,占样本经营管理企业平均花费时间的 7.27% 左右 (0.025/0.344)。从经济显著性来看,撤县设区使企业家每天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时间增加 31.28 分钟 ( $0.025 \times 20.85 \text{ 小时} \times 60 \text{ 分钟/小时}$ ,样本中企业家平均每天花在经营管理、公关招待和休息学习三项活动上的总时间为 20.85 小时)。

其次,撤县设区直接影响改革县市和市辖区。研究发现,撤县设区改革打破了市区与改革县之间的行政分割,减少了行政壁垒造成的边界扭曲和资源误配,扩大已有市辖区的规模,可以产生更高程度的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形成更高水平的集聚效应(唐为、王媛,2015);大城市的集聚效应带来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使得高技能人群和企业家倾向于延长工作时间(Rosenthal 和 Strange, 2008;Francis 等,2016)。此外,改革县合并到市辖区后,原县辖区内的企业家也可以享受到更多的同伴效应(Peer Effect),与此同时,市辖区企业也享受到撤县设区带来的市辖区扩大的集聚效应的影响。因此,表 2 第(2)和(4)列以改革市辖区和改革县市的企业作为处理组,以非改革城市企业作为对照组。第(2)列回归结果表明,撤县设区显著增加了企业家在生产性活动上的时间分配,经营管理企业的时间比例显著增加 4.3 个百分点,占样本经营管理企业平均花费时间的 12.5% 左右 (0.043/0.344)。从经济显著性来看,撤县设区使企业家每天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时间增加 53.79 分钟。第(4)列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企业主在经营管理活动上花费时间的水平值对数,结果显示撤县设区使得企业主经营管理时间增加 9.7% (大约是 1 小时/天,同第(2)列结果类似)。

最后,考虑撤县设区改革的外溢效应影响。研究发现,行政区划作为一种空间治理的基础手段,是影响区域发展的重要因素(赵建吉等,2020)。市辖区获得了撤县设区改革所产生的正向影响,有利于地市更好发展,进而产生改革的外溢效应。表 2 第(3)和(5)列基于城市层面进行分析,将发生撤县设区的地级市作为处理组,样本期内未经历撤县设区的城市视为控制组。第(3)列回归结果表明,撤县设区显著增加了企业家在生产性活动上的时间分配,经营管理企业的时间比例显著增加 3.9 个百分点,占样本经营管理企业平均花费时间的 10% 左右。从经济显著性来看,撤县设区使企业家每天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时间增加 48.79 分钟。第(5)列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企业主在经营管理活动上花费时间的水平值对数,结果显示撤县设区使得企业主经营管理时间增加 8.6%。

表 2 第(6)~(7)列更改双重差分识别中的处理组和控制组设定。第(6)列将改革城市的非改革县作为处理组,非改革城市区县作为控制组,考察外溢效应,撤县设区改革对企业家经营管理时间的正向作用依然显著。这说明撤县设区改革对本地市内未改革区县企业家的管理活动时间增加有正向的溢出效应。第(7)列进一步将改革城市非改革县作为控制组,改革地市的改革县和市辖区作为处理组,考察撤县设区改革对改革县区和本地市内未改革县的影响是否有差异。结果表明,同一个城市内部,撤县设区改革促使改革县区比非改革县的企业家花费更多时间到经营管理活动上,这说明正向的外溢效应小于直接的改革效应。

本文做了其他稳健性检验。(1)考虑到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中国政府推出的“四万亿元”计划可能对本文结果带来的冲击,回归仅使用 2008 年之前样本展开考察。(2)采用 PSM-DID 方法,选取城市层面人均 GDP 等经济指标作为标准进行倾向得分匹配,选取出控制组样本进行 PSM-DID 估计。(3)使用原始全样本展开考察。(4)进一步控制反映城市规模和发展水平的 GDP 和人口规模的变量。(5)控制其他行政区划变革的政策,包括多种类型的行政区划调整:省直管县(Li 等,2016)、撤县设市(唐为,2019a;刘晨晖、陈长石,2019),还有一些地市设立新区,个别地市更改名称、建立新城等。(6)参考 Li 等(2016)和 Heblich 等(2018)等文献,在公式(1)中同时控制处理组的时

间趋势变量。(7)将 2002 年之后成立的企业样本删除,仅使用老企业进行考察。(8)考虑到直辖市有着更高的行政地位和更多的资源配置,将直辖市样本删除。以上稳健性讨论中,基准结果仍然不变。<sup>①</sup>

综上,基准回归说明,撤县设区改革显著增加辖区内民营企业家在经营管理活动上花费的时间,且改革具有正的外溢效应。正是由于市辖区受撤县设区改革直接影响和改革外溢效应的存在,后文所有的分析均同时汇报考虑地市层面的回归(包含外溢效应)和剔除地市非改革县市样本(改革地市的改革县市+市辖区和非改革地市)的回归分析结果。<sup>②</sup>

表 2基准回归

被解释变量	经营管理时间占比			ln( 经营管理时间)		经营管理时间占比	
模型分类	基准回归			稳健性回归		外溢效应	
处理组	改革县	改革市辖区 + 改革县市	改革城市	改革市辖区 + 改革县市	改革城市	改革城市 非改革县	改革市辖区 + 改革县市
控制组	非改革城 市区县	非改革 城市	非改革 城市	非改革 城市	非改革 城市	非改革城 市区县	改革城市 非改革县
模型编号	(1)	(2)	(3)	(4)	(5)	(6)	(7)
<i>Post</i> × 撤县设区	0. 025 * (0. 013)	0. 043 *** (0. 015)	0. 039 *** (0. 013)	0. 097 *** (0. 035)	0. 086 ** (0. 034)		0. 019 *** (0. 006)
<i>Post</i> × 非政策县						0. 031 ** (0. 012)	
总工作 时间	- 0. 006 *** (0. 001)	- 0. 006 *** (0. 001)	- 0. 006 *** (0. 001)	0. 054 *** (0. 002)	0. 053 *** (0. 002)	- 0. 006 *** (0. 001)	- 0. 007 *** (0. 001)
性别	0. 000 (0. 004)	- 0. 001 (0. 004)	0. 000 (0. 004)	0. 004 (0. 009)	0. 005 (0. 008)	0. 004 (0. 006)	- 0. 001 (0. 005)
年龄	0. 001 *** (0. 000)	0. 001 *** (0. 000)	0. 001 *** (0. 000)	0. 002 *** (0. 000)	0. 002 *** (0. 000)	0. 000 (0. 000)	0. 001 *** (0. 000)
受教育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年龄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县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8712	8014	8828	8071	8884	3650	4836
R <sup>2</sup>	0. 221	0. 164	0. 154	0. 371	0. 358	0. 245	0. 172

注:括号内是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下显著。下同。年份虚拟变量是指调查年份,企业年龄虚拟变量是指企业注册为私营企业的年份,受教育虚拟变量是指企业家的受教育类型。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有回归均是基于地理相邻样本匹配后再进行双重差分估计;改革市辖区是指改革地市的市辖区。第(6)列将处理组定义为改革城市非改革区县结论类似;第(7)列将处理组定义为改革县、控制组定义为改革城市非改革区县结论类似。如无特殊说明,下同。

① 篇幅所限,未展示基准结果,如有需要,请与作者联系。  
② 本文是基于企业微观层面的分析,仅将改革县作为处理组,部分县市在各调查年份包含的企业数量可能并不多,会在一定程度上使样本小所导致的部分结果(例如异质性分析、异常值)的偏误较大。



2. 时间来自哪儿

基准考察发现撤县设区改革后企业家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时间显著增加,这里进一步分析时间来自哪儿,研究企业家各项活动所花时间如何受改革影响。首先看企业家用于生产经营、公关招待和学习休息的总支配时间是否有显著变化,表3中第(1)列显示,撤县设区后企业家总的支配时间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这说明撤县设区只是改变了企业家在不同活动上的时间分配,并未增加他们的总工作时间。第(2)~(3)列分别以改革城市样本和改革市辖区+改革县为处理组,回归结果表明,撤县设区使企业家公关招待时间下降2.8个和3.2个百分点。从水平值看,第(4)列公关招待时间下降11.4%。第(5)~(6)的考察显示,企业家用于休息学习的时间并未随改革发生显著变化。上述分析说明,撤县设区改革后,企业家的公关、招待时间明显减少,将更多时间用于企业经营管理,初步证实了撤县设区改革对民营企业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活动时间配置的影响。

表 3 时间配置

被解释变量	总工作时间	公关招待占比		ln(公关招待时间)	休息学习占比		ln(休息学习时间)
处理组	改革城市	改革城市	改革市辖区+改革县	改革城市	改革城市	改革市辖区+改革县	改革城市
控制组	非改革城市	非改革城市	非改革城市	非改革城市	非改革城市	非改革城市	非改革城市
模型编号	(1)	(2)	(3)	(4)	(5)	(6)	(7)
<i>Post</i> × 撤县设区	0.835 (0.634)	-0.028 *** (0.008)	-0.032 *** (0.010)	-0.114 *** (0.035)	-0.011 (0.013)	-0.012 (0.013)	-0.047 (0.02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8884	8828	8142	8884	8828	8142	8884
R <sup>2</sup>	0.152	0.197	0.203	0.302	0.149	0.178	0.652

五、机制分析

中国式分权体制下,经济增长的地方竞争压力使区域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周黎安,2007),不同行政区之间存在严重的市场分割(Young,2000)。撤县设区改革使原本的县成为市辖区一部分,可以显著地削弱区域发展的边界效应,促进区域市场一体化和资源优化配置(唐为,2019b),减少了行政壁垒导致的各种扭曲。随着边界效应的弱化,辖区内企业在整个区域内从事经营活动受到的管制也会减弱。也就是说,撤县设区改革不仅削弱边界地区的分割效应,而且可以改善整个辖区范围内的营商环境,进而影响企业家将过去从事公关招待的时间配置到经营管理上,减少当地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和摊派。前面研究发现,企业家增加的经营管理时间主要来自公关

招待的减少,而既有文献认为公关招待是企业进行寻租活动的重要方式(Cai 等,2011;Dong 等,2016;钟粤俊等,2019)。地区营商环境对企业经营绩效和创新都有显著的影响(夏后学等,2019),遗憾的是,现有文献还没有讨论撤县设区对营商环境的影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乏度量各地区营商环境的多年份指标。<sup>①</sup> 这里分别从企业和行业层面验证撤县设区改革对辖区营商环境改善的作用。

1. 微观企业视角下的营商环境变化

实际上,作为多年份的跨地区调查,CPES 调查还涉及两个重要指标——“企业去年面临政府和社会组织的摊派费用”和“企业的公关招待费用”。既有文献多用吃喝费用、摊派和公关招待费度量企业的非生产性支出,反映企业的非生产性活动和寻租活动(Cai 等,2011;Dong 等,2016;钟粤俊等,2019)。首先,本文从微观视角以企业支出的摊派费用和公关招待费用来反映企业面临的营商环境变化。<sup>②</sup> 营商环境越好的地区,企业的非生产性摊派费用支出越少,企业主也将更多的时间用于经营管理,同时减少公关招待的时间。除了营商环境的改善,撤县设区还可以带来辖区企业数量增加(邵朝对等,2018),也可能带来政府对每家企业的平均摊派和逼租减少,故企业更多增加生产。由于摊派费用在 1997—2010 年的调查均有涉及,我们得以将撤县设区改革的处理组和控制组样本区分来看。

表 4 揭示出撤县设区改革对企业各类税费支出的影响。第(1)~(2)列表明,撤县设区改革显著降低了辖区内企业的摊派费用支出。从经济显著性看,改革使辖区内企业的摊派费用减少 36.4% 和 38.3%。第(3)~(4)列考察显示,撤县设区改革可以显著降低企业的公关招待费,这意味着企业寻租行为的减少(类似用公关招待费用度量企业寻租行为的文献包括:Dong 等,2016;钟粤俊等,2019)。从经济显著性来看,撤县设区使得企业的公关招待费用下降 27.7% 和 36.1%。理论上,撤县设区属于行政区划改革,不应造成正规的企业税费变化。第(5)~(6)列显示,企业全年缴纳的各种规费和税费均未受到改革的显著影响。以上考察说明,撤县设区不会影响企业缴纳的 normal 税费,但会降低企业的公关招待费和摊派费用,这意味着作为制度软环境的营商环境在撤县设区改革后得到改善(董志强等,2012)。

表 4 撤县设区对企业各类税费支出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ln(摊派费)		ln(公关招待费)		ln(正常规费)	ln(缴税费)
处理组	改革城市	改革市辖区 + 改革县市	改革城市	改革市辖区 + 改革县市	改革城市	改革城市
控制组	非改革城市	非改革城市	非改革城市	非改革城市	非改革城市	非改革城市
模型编号	(1)	(2)	(3)	(4)	(5)	(6)

① 董志强等(2012)使用世界银行发布的《2008 中国营商环境报告》中的 30 个城市数据;夏后学等(2019)、于文超和梁平汉(2019)研究营商环境的影响均是基于世界银行 2012 年针对中国营商环境开展的“China-Enterprise Survey”的 25 个城市数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仅覆盖少数城市且只有两个年份,难以形成多城市面板数据。

② 企业的公关招待等行为,并不局限于针对政府官员,还包括企业对企业的公关招待费用。考虑到企业间商业交易更符合市场交易准则,因此民营企业对其他企业的公关活动应主要针对那些控制着巨大资源或具有巨大市场势力的企业(比如其生产要素上游企业)。由于外部监管和对投资者保护不力,内部监控体系不完善,控制着巨大资源、有巨大市场势力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者也可以设“租”(例如企业间的商业贿赂、收买、回扣等),从而引发民营企业向它们寻租。若将掌控巨大资源、有巨大市场势力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者视为“官员”,则官员设租的理论分析可移植到对企业间的寻租分析。

续表 4

被解释变量	ln( 摊派费 )		ln( 公关招待费 )		ln( 正常规费 )	ln( 缴税费 )
<i>Post</i> × 撤县设区	- 0. 364 ** ( 0. 146 )	- 0. 383 *** ( 0. 144 )	- 0. 277 * ( 0. 154 )	- 0. 361 ** ( 0. 177 )	- 0. 133 ( 0. 176 )	0. 040 ( 0. 167 )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6816	6328	8667	8023	7594	10499
R <sup>2</sup>	0. 176	0. 177	0. 324	0. 326	0. 339	0. 621

2. 行业层面下的营商环境变化

不同行业的企业受政府管制的程度不同(汪伟、史晋川,2005;罗党论、刘晓龙,2009;罗党论等,2016),受政府管制更多、更深的行业受到行政壁垒和营商环境的影响更大。因此,撤县设区应该对管制类行业的民营企业家的影响更大。参考夏立军和陈信元(2007)、Dong 等(2016)和钟粤俊等(2019)的做法,将涉及国家安全、自然垄断、提供公共服务的行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定义为管制型行业(或特殊行业),具体包括:采矿业、电力煤气水、建筑业、交通运输、信息服务业、住宿餐饮业、房地产、公共设施等8个行业。表5考察撤县设区改革对不同管制程度企业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撤县设区显著增加了管制型行业中民营企业家的生产经营活动时间,这些企业的摊派费用支出也随着改革显著下降;对于非管制型行业的民营企业,撤县设区对企业主的经营管理时间和企业的摊派费用均没有显著影响。

表 5 行业视角下的营商环境变化

被解释变量	经营管理时间占比		ln( 摊派费 )	
	管制型行业	非管制型行业	管制型行业	非管制型行业
模型范围				
模型编号	( 1 )	( 2 )	( 3 )	( 4 )
<i>Post</i> × 撤县设区	0. 042 *** ( 0. 012 )	0. 019 ( 0. 039 )	- 0. 349 *** ( 0. 131 )	- 0. 311 ( 0. 304 )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6516	2310	5024	1776
R <sup>2</sup>	0. 159	0. 191	0. 166	0. 273

3. 排除竞争性假说

撤县设区可能带来两方面影响:一是领导行政级别的提升,改变官员晋升的激励动向,从而影响经济发展的动力和企业面临的寻租和逼租;二是地区财政税收体系的变化,如果改革地区得到上级更多的财政补助,也可能减少当地对企业的摊派寻租活动。本部分排除这些竞争性假说对前文结论的影响。首先,剔除官员晋升激励的影响,采用的方式是控制住可能影响官员晋升的各类因素,以及在改革时是否发生官员变更。既有文献发现影响官员晋升的主要因素包括官员年龄、任职时长、是否刚来任职、官员平均任期的时长等。将市委书记数据与本文样本进行匹配,表6第(1)~(2)列控制住这些因素以及改革时是否发生官员更替,回归结果表明,撤县设区对企业家增加经营管理时间的影响仍然存在。

然后,剔除撤县设区带来的财政补贴、转移支付的影响。根据《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得到各地的收入合计、本年收入、专项转移支付收入和 2007 年以前的地方企业所得税收入的数据,表中第(3)~(6)列对这些地方财政变量予以控制,结果发现撤县设区对企业家时间配置的影响依然稳健。

表 6 剔除官员晋升激励和地方财税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经营管理时间占比					
	地理配对	全样本	地理配对	全样本	地理配对	全样本
模型范围	地理配对	全样本	地理配对	全样本	地理配对	全样本
模型编号	(1)	(2)	(3)	(4)	(5)	(6)
<i>Post</i> × 撤县设区	0.025 * (0.014)	0.026 * (0.014)	0.043 *** (0.014)	0.042 *** (0.013)	0.032 *** (0.009)	0.028 *** (0.009)
书记任职时长	-0.001 (0.001)	-0.000 (0.001)				
书记任期时长	0.002 ** (0.001)	0.001 (0.001)				
是否官员更替	-0.004 (0.005)	-0.002 (0.004)				
官员年龄	-0.000 *** (0.000)	-0.000 *** (0.000)				
ln(本年收入合计)			0.000 (0.003)	-0.000 (0.002)	0.009 * (0.005)	0.006 # (0.004)
ln(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0.004 * (0.002)	0.004 ** (0.002)	0.001 (0.002)	0.000 (0.002)
ln(企业所得税收入)					-0.007 * (0.004)	-0.006 ** (0.003)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7554	10980	8619	12871	6208	9144
R <sup>2</sup>	0.152	0.153	0.172	0.187	0.129	0.169

六、进一步讨论

1. 动态效应与平行趋势检验

虽然撤县设区改革外生于企业家本身的决策,但是双重差分设定依赖处理组和控制组事前的平行趋势,如果改革区域与对照组事前的平行趋势不存在,那么 DID 估计结果将是有偏的。本部分考察撤县设区改革事前的平行趋势以及事后的动态效应,构造如下的动态 DID 模型进行事件史考察(Event Study):

$$Time\_allocation_{ijt} = \beta_0 + \sum_{s=1}^T \beta_s Merger_j \times Post_t(s) + \beta_2 X_{ijt} + \delta_j + \sigma_t + \varepsilon_{ijt}$$

(2)

其中,  $Post_t(s)$  为改革时点虚拟变量, 改革后的第  $s$  年赋值为 1, 其余赋值为 0。这里将改革前 6 年以上的时期归并为改革前第 6 年, 将改革后 6 年及以上的时期归并为改革后第 6 年。此外, 由于民营企业调查数据每两年进行一次, 为使改革时期同民营企业调查年份对应, 本文将  $Pre(3)$  定义为改革发生前的第 5 ~ 6 年, 将  $Pre(2)$  定义为改革前的第 3 ~ 4 年, 将  $Pre(1)$  定义为改革前的第 1 ~ 2 年, 将  $Post(1)$  定义为改革之后的第 1 年(当年)和第 2 年, 将  $Post(2)$  定义为改革后的第 3 ~ 4 年, 将  $Post(3)$  定义为改革之后的第 5 ~ 6 年, 将其中  $Pre(1)$  作为基准对照组。<sup>①</sup> 其余控制变量同式(1)。

表 7 给出动态 DID 回归的结果, 第(1) ~ (2)列和第(3) ~ (4)列考察企业主的时间分配。可以发现, 在撤县设区改革后第 1 期, 企业主即将更多的时间用于经营管理活动, 同时减少了公关招待时间, 这种效应在改革后的第 2 期和第 3 期并未消失, 说明撤县设区改革存在持续的影响。第(5) ~ (6)列考察显示, 改革后第 1 期企业面临的摊派费用即出现显著的下降, 并表现出持续的影响。根据政策前的动态效应, 可以发现改革前企业的时间分配、摊派费用与基准年份相比均没有显著的变化, 说明政策干预前满足平行趋势要求, 双重差分的估计结果可靠。

表 7 动态效应与平行趋势检验

被解释变量	经营管理时间占比		公关招待时间占比		ln(摊派费)	
处理组	改革城市	改革市辖区 + 改革县市	改革城市	改革市辖区 + 改革县市	改革城市	改革市辖区 + 改革县市
控制组	非改革 城市	非改革 城市	非改革 城市	非改革 城市	非改革 城市	非改革 城市
模型编号	(1)	(2)	(3)	(4)	(5)	(6)
$Pre(3) \times$ 撤县设区	0.017 (0.013)	0.019 (0.012)	-0.000 (0.013)	0.001 (0.012)	-0.123 (0.137)	-0.153 (0.148)
$Pre(2) \times$ 撤县设区	0.010 (0.007)	0.011 (0.007)	0.001 (0.007)	-0.002 (0.007)	-0.089 (0.153)	-0.088 (0.162)
$Post(1) \times$ 撤县设区	0.037 *** (0.013)	0.042 ** (0.016)	-0.029 *** (0.009)	-0.036 *** (0.011)	-0.329 ** (0.154)	-0.373 ** (0.151)
$Post(2) \times$ 撤县设区	0.036 * (0.019)	0.035 * (0.021)	-0.022 * (0.012)	-0.025 * (0.014)	-0.433 ** (0.177)	-0.415 ** (0.171)
$Post(3) \times$ 撤县设区	0.052 ** (0.020)	0.056 ** (0.022)	-0.042 *** (0.014)	-0.050 *** (0.015)	-0.255 (0.169)	-0.202 (0.16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8828	8014	8828	8014	9634	9294
R <sup>2</sup>	0.155	0.166	0.198	0.203	0.210	0.224

2. 异质性讨论: 集聚效应

这里进一步考察撤县设区改革的异质性影响, 探讨背后的集聚效应影响, 从以下两方面展开。

① 每 2 年合并的另一个原因是政策发生前的 1、3、5 年和政策发生后的 1、3、5 年的样本比较少, 这样能让各时期样本数均匀。

首先,考察不同城市规模下改革的差异影响。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中,撤县设区带来的规模集聚效应存在差异,有效的撤县设区能充分发挥规模集聚效应,无效的撤县设区带来的规模集聚效应的作用不明显。大城市的撤县设区产生的聚集效应更大,本文将省会和计划单列市视为核心大城市,其他为非核心城市。表 8 第(1)~(4)列基于城市类型分类,回归结果表明,撤县设区显著增加了核心大城市中企业家的生产性活动,并减少了企业的摊派费用;对于非核心城市的企业,撤县设区对企业主的生产经营时间和企业的摊派费用均无显著影响。

其次,前文考察发现撤县设区促进企业家时间的优化配置,是否所有的改革都有明显作用呢?理论上距离市辖区越近的县改区更能发挥城市经济的规模效应,对企业家行为的影响也会更大,这里考察距离在撤县设区改革中的作用,将改革县到市辖区的距离纳入回归考察,结果如表 8 第(5)~(6)列所示。城市以及区县层面的考察均显示,距离市辖区距离越近的县改区对企业家的生产经营活动时间影响越大,改革的边际效应随着距离增加而逐渐变小(三重交叉项系数显著为负)。根据回归系数,如果改革县距离市中心超过 21 公里( $\exp\left(\frac{0.086}{0.028}\right)$ ),改革带来的边际效应下降为 0。这与撤县设区通过区域一体化集聚促进增长的研究相一致(Tang 和 Hewings, 2017),只有距离市辖区较近的撤县设区改革才能发挥出区域一体化的集聚效应。

表 8 是否为核心大城市

被解释变量	经营管理 时间占比	ln(摊派费)	经营管理 时间占比	ln(摊派费)	经营管理时间占比	
模型范围	核心大城市		非核心大城市		城市层面	县区层面
模型编号	(1)	(2)	(3)	(4)	(5)	(6)
$Post \times$ 撤县设区	0.047 *** (0.008)	-0.767 *** (0.171)	0.035 (0.022)	0.031 (0.239)	0.086 *** (0.027)	0.075 ** (0.032)
$Post \times$ 撤县 设区 $\times \ln(\text{到}$ 市辖区距离)					-0.028 ** (0.014)	-0.028 ** (0.01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3789	2977	5046	3845	8841	4712
R <sup>2</sup>	0.181	0.146	0.148	0.222	0.155	0.162

七、结论与政策含义

近几十年来,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撤县设区成为地区消除行政壁垒、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行政区划调整不仅仅是简单的财权、事权等行政管理职能的变更,本研究关注行政区划调整下,企业家行为尤其是时间配置行为的变化。本文发现,撤县设区改革使民营企业企业家将更多的时间配置到经营管理等生产性活动上,减少了公关招待等非生产性活动上的时间配置。这意味着企业家才能配置效率的改进。进一步地,从企业、行业和城市层面等维度的机制分析发现,撤县设区改革有助于改善地区营商环境,减少企业的公关招待和摊派费用支出。异质性考察发现,省会、计划单列市等规模较大的城市中撤县设区改革带来的正向效应越显著,而规模越大的企业在



改革中受到的影响更大。对距离的考察显示,距市中心 21 公里以内的县(县级市)改区才能带来显著的效应。

本研究有着明显的政策含义。在发挥城市群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形势要求下,合理的调整城市行政规划,有助于打破行政分割带来的要素流动障碍,促进区域一体化并改善地区营商环境。以撤县设区为例,合理的区划调整可以促使民营企业将其企业家才能更多地配置到经营管理等生产性活动上,减少公关招待等非生产性活动上的时间安排,企业的公关招待费用和摊派费用也随之下降,这意味着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此外,只有规模较大的核心城市,以及距离市辖区较近的县或县级市推行撤县设区,才能带来辖区内企业家行为的显著变化,这意味着一拥而上的撤县设区并不可取,具体情况具体讨论的综合考量至关重要。合理的区划调整带来的营商环境改善,不仅有助于完善构建“亲”“清”型政商关系,也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最终实现经济更高质量增长。

#### 参考文献:

- 董志强、魏下海、汤灿晴:《制度软环境与经济发展——基于 30 个大城市营商环境的经验研究》,《管理世界》2012 年第 4 期。
- 李世刚、尹恒:《寻租导致的人才误配置的社会成本有多大?》,《经济研究》2014 年第 7 期。
- 李世刚、尹恒:《政府-企业间人才配置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地级市数据的经验研究》,《经济研究》2017 年第 4 期。
- 刘晨晖、陈长石:《撤县设市、行政扩权与经济增长——基于断点回归方法的估计》,《经济评论》2019 年第 2 期。
- 卢盛峰、陈思霞:《政策偏袒的经济收益:来自中国工业企业出口的证据》,《金融研究》2016 年第 7 期。
- 卢盛峰、陈思霞:《政府偏袒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吗?——来自中国的准自然实验》,《管理世界》2017 年第 5 期。
- 罗党论、刘晓龙:《政治关系、进入壁垒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2009 年第 5 期。
- 罗党论、廖俊平、王珏:《地方官员变更与企业风险——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2016 年第 5 期。
- 邵朝对、苏丹妮、包群:《中国式分权下撤县设区的增长绩效评估》,《世界经济》2018 年第 10 期。
- 唐为、王媛:《行政区划调整与人口城市化:来自撤县设区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2015 年第 9 期。
- 唐为:《经济分权与中小城市发展——基于撤县设市的政策效果分析》,《经济学(季刊)》2019a 年第 1 期。
- 唐为:《分权、外部性与边界效应》,《经济研究》2019b 年第 3 期。
- 王贤彬、谢小平:《区域市场的行政整合与经济增长》,《南方经济》2012 年第 3 期。
- 汪伟、史晋川:《进入壁垒与民营企业的成长——吉利集团案例研究》,《管理世界》2005 年第 4 期。
- 吴晓瑜、王敏、李力行:《中国的高房价是否阻碍了创业?》,《经济研究》2014 年第 9 期。
- 夏后学、谭清美、白俊红:《营商环境、企业寻租与市场创新——来自中国企业营商环境调查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2019 年第 4 期。
- 夏立军、陈信元:《市场化进程、国企改革策略与公司治理结构的内生决定》,《经济研究》2007 年第 7 期。
- 于文超、梁平汉:《不确定性、营商环境与民营企业经营活力》,《中国工业经济》2019 年第 11 期。
- 袁志刚、解栋栋:《中国劳动力错配对 TFP 的影响分析》,《经济研究》2011 年第 7 期。
- 张维迎:《市场的逻辑(增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 张维迎、王勇:《企业家精神与中国经济》,中信出版社 2019 年版。
- 赵建吉、王艳华、王珏、苗长虹:《省直管县改革背景下地级市空间溢出效应对县域产业结构的影响》,《地理学报》2020 年第 2 期。
- 钟粤俊、张天华、董志强:《政治联系会提高企业开工率吗?——基于中国私营企业调查的经验研究》,《经济学报》2019 年第 1 期。
-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 年第 7 期。
- Baumol, W., Entrepreneurship: Productive, Unproductive and Destructive.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8, No. 5, 1990, pp. 893 - 921.
- Cai, H., Fang, H., & Xu, L. C., Eat, Drink, Firms, Government: An Investigation of Corruption from the Entertainment and Travel Costs of Chinese Firms.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54, No. 1, 2011, pp. 55 - 78.

27. Dong, Z. , Wei, X. , & Zhang, Y. , The Alloc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Efforts in a Rent-seeking Society: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 Vol. 44, No. 2, 2016 , pp. 353 – 371.
28. Fan, S. G. , Li, L. X. , & Zhang, X. B. , Challenges of Creating Cities in China: Lessons from a Short-lived County-to-city Upgrading Policy.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 Vol. 40, No. 3, 2012 , pp. 476 – 491.
29. Francis, B. B. , Hasan, I. , John, K. , & Waisman, M. ,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CEO Compensation.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 Vol. 51, No. 6, 2016 , pp. 1925 – 1953.
30. Heblich, S. , Redding, S. J. , & Sturm, D. M. ,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etropolis: Evidence from London.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2018, No. w25047.
31. Hsieh, C. T. , Hurst, E. , Jones, C. I. , & Klenow, P. J. , The Allocation of Talent and US Economic Growth. *Econometrica* , Vol. 87, No. 5, 2019 , pp. 1439 – 1474.
32. Li, P. , Lu, Y. , & Wang, J. , Does Flattening Government Improve Economic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 Vol. 123, No. 11, 2016 , pp. 18 – 37.
33. Murphy, K. M. , Shleifer, A. , & Vishny, R. W. , The Allocation of Talent; Implications for Growth.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 Vol. 106, No. 2, 1991 , pp. 503 – 530.
34. Rosenthal, S. S. , & Strange, W. C. , Agglomeration and Hours Worked.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 Vol. 90, No. 1, 2008 , pp. 105 – 118.
35. Tang, W. , & Hewings, G. J. , Do City-county Mergers in China Promote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 Vol. 25, No. 3, 2017 , pp. 439 – 469.
36. Young, A. , The Razor's Edge: Distortions and Incremental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 Vol. 115, No. 4, 2000 , pp. 1091 – 1135.

## Administrative Boundary Adjustment and Entrepreneurs' Time Allocation: Evidence from City-County Merger in China

ZHONG Yueju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200062)

LIANG Chao (Shandong University, 250100)

**Abstract:** Entrepreneurs' talents are one of the important driving forc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ity-county merger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market integration and optimizing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but few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he impact of city-county merger and urban agglomeration on entrepreneurs' micro-management behavior.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administrative boundary adjustment on entrepreneurs' time allocation. Based on the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 model, we find that city-county merger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time entrepreneurs spend on production activities, and has spillover effect on the entire city. The city-county merger improves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rent-seeking and apportioning expenses. The effect is more prominent in large cities, and the farther away from the city center the weaker the positive effect, which reflects the importance of the agglomeration effect. The policy implication of this paper is that: the city-county merger should apply in areas that conform to the law of agglomeration so that it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alloc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to production and business activities.

**Keywords:** City-County Merger, Entrepreneurs' Time Allocation, Productive Activity, Rent-Seeking, Apportioning Expenses

**JEL:** M13, R11